張國立危機處理張默吸毒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張國立兒子張默吸食大麻被捕遭拘留，對張國立來說當然是晴天霹靂。

在平伏傷心、震驚心情的同時，張國立馬上作出相應行動，火速發出一個聲明，內容軟硬兼備，首先承認張默犯了事，並表明立場，支持警方打擊吸毒行為；軟的一面，是他道出了作為父親的感受，他覺得愧疚，卻沒表示憤怒，他把部分責任攬上身，為張默對社會造成不良影響致歉，並承諾會與張默父子同心給大家一個交代，又乞求各界給張默改過的機會，字裡行間流露對張默的憐愛；最後交代自己不會就事件接受任何訪問，是一個得體到位的聲明，亦是一個很好的危機處理。他的快速反應，證明他肯面對，不逃避、也不打算狡辯。盡快出聲明的好處是防止外界諸多揣測，愈描愈黑，到時才來解畫，就算講實話也會被認為是砌詞自辯。

患難見真情，張國立老友馮小剛也發出聲明，自責作為叔叔，沒有好好管教張默，他承諾會與張國立攜手教導張默，令他改過自新，又希望各界給予張默機會。馮小剛這個聲明，猶如雪中送炭，尤其在爭名奪利的娛樂圈，沒有即時劃清界線，沒有落井下石，明明可以置身事外，馮小剛選擇跟他共同面對，是真漢子的表現。可見娛樂圈有真正的友誼。

張默所屬的華誼兄弟也出了個聲明，口徑與張國立馮小剛同出一轍，都是請外界給他改過機會，這對仍被拘留的張默來說是一顆定心丸，表示公司沒放棄他。香港的經理人公司在這方面比較嚴厲，好像之前關楚耀和衛詩在日本涉毒被捕，衛詩老闆黎明馬上跟她解約，關楚耀唱片公司馬上將他雪藏，命令他改過，更要看他表現才決定是否讓他繼續出碟。

張默萬千寵愛，今年二十九歲，不是十九歲，不可以年少無知做藉口：可能作為名人下一代，壓力很大；可能父母自小仳離，對他心理造成影響；可能他要組樂隊靠音樂維生，張國立反對，用手段令隊友踢他離隊，令他痛恨爸爸，他要吸毒發洩。但作為一個成熟的人，不可整天活在怨憤中，因為有任何出錯，不單他要全部負責，連帶父親、叔叔、公司也要替他承擔，張默過意得去嗎？別再任性貪玩了。

將目光放遠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和導演朋友聊天，他慨嘆現代人很慘，因為我們的眼光正變得愈來愈窄。

他解釋，以前我們看電影，一定是看大銀幕，後來隨着家用影音設施的普及，逐漸變成躲在家中看電視，當下更進一步縮小為只看Table及手機，視野變得愈來愈小。他沒有再解釋為何如此的轉變會令「現代人很慘」，我想這除了是指觀影的享受正逐步被剝削外，亦暗示了眼光愈小，我們也容易變得愈不快樂。

試想想，一個人放眼的圈子愈窄，往往愈容易活得挫折重重，皆因小小的問題，也會被無限地放大。例如若一個人的眼中只有另一半，那麼她／他的一切言行也會變成世界的全部，情人的一次遲到、一次爽約，也會變成他／她生命中的九級大地震，分手或背叛更會慘成世界末日，生活只變得惶惶不可終日，日子灰暗得生不如死。

其實當我們痛苦的時候，最重要就是懂得把目光放遠，縱使不能立刻把傷痛洗去，也會令我們不會覺得如此悲慘：我不是要各位偉大得去想遠方還有戰爭和饑餓，而是只要放眼向前，便會發現將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性，當下的挫折不過是一個階段、一場試煉，甚或是茶杯中的一場風波，苦夠了便站起來，何必為此而錯失更大的森林及遠處更好的風光？

中國的學理教人要「天人合一」，這不單是指生活的規律要與四時晝夜去配合，我們的胸襟亦要變得能與天比高，若在任何情況及環境中也能如天一樣高高地俯瞰所有，不論是大悲還是狂喜，到頭來也不過是無垠的平靜內一個小小的漣漪。

玄武湖的今昔

琴台客聚 彥火

此次夜遊秦淮河，有點兒失望，因那一份膩膩的舊時六朝月色已褪化得杳無痕跡，只有一色的商業味。倒是當地文藝界的小高，帶我遊覽玄武湖，意興盎然。

到南京，遊覽玄武湖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節目。

曾記得，三十年前的八月初秋，我們一行十餘眾，抹上一身絢麗的霞彩，通過古色古香的玄武門，來到玄武湖畔，我們曾為眼前的綺麗景色着迷。秋水明亮，玄武湖千頃波濤，靜得如一個處子，亮得似一面鏡子，湖波將天邊的殘陽，反射出金光粼粼，彩霞似錦。我們都陶醉在這夕照昏黃的美景中。

眺望對岸，一列嶄新的建築物整齊地倒映在水中，與湖畔豎着的大紅牌子，構成一幅既有新意境又有富麗的圖案。

今次冬遊，玄武湖一點也沒有瑟縮的況味，卻塗上淡淡蒼茫，又不失韻味。玄武湖歷史悠久，自東晉以來，便是京都勝跡，古稱後湖，又名練湖，後因荒廢，以致逐漸淤塞，明太祖奠都南京後，曾加以浚深，並在湖中闢若干個洲，建設一個圖書館；國民黨時期，改為五洲公園。後來政府將玄武湖加以整修；綠化，並於一九五四年築一條一千六百米的長堤，穿過湖心，連接湖中數洲，沿堤兩岸，栽植楊柳、桃花、杏花，刻意美化，使玄武湖煥發出青春的光彩。

玄武湖於春秋季最美。春天紫金山上嫣紅的桃花與雪白的梨花，將湖水填上絢爛繽紛的色彩；秋天，楓紅蘆白，又是另一番景致。上一趟來得早，楓葉未紅透，蘆花也未盡白，雖然這樣，卻又有清雅、恬淡的感覺。

三十年前目睹玄武湖荷花的盛放，湖心荷葉田田，隨風翻動，宛如一道凝碧流浪，送來縷縷幽香，與臨湖搖曳的柳綠，配搭那麼諧適、渾然一體。

如今荷花已凋萎，殘枝敗葉，蔚然國畫中的殘荷，十分別致。

玄武湖除了著名水產如魚、藕、蓮子等，也是盛產水果的地方，如櫻桃、杏等，記得當年甫抵南京時，便聽到一首歌謠，琅琅上口，歌謠唱道：「長江水山上流，漫山遍野綠油油，果樹湖山頭，行路不小心，果子打到頭。」這首歌謠，唱出了長江兩岸的好風光，也是今天玄武湖的寫照。

我們在玄武湖漫步，近處是如織柳林，遠山如黛，湖心萋萋芊芊，樹叢中露出紅牆綠瓦，湖光山色，如詩似畫。竟不似殘冬，更像春深。小高說，南京這些年天氣暖和得多了，冬天大都徘徊在十度左右，冬天不太冷，夏天不太熱。

我們真想投身湖中，駕一葉扁舟，抹一身殘陽，輕棹畫槳，穿梭往還於柳弦中，去捕捉湖光水色，奈何晚上有宴會，只好踏上歸途。

回程路上，小高特別提到玄武湖之名的來源——

玄武湖古稱桑泊。原來只是一塊因斷層作用而形成的沼澤濕地，湖水來自鍾山北麓。三國時吳王孫權引水入宮苑後湖，玄武湖才初具湖泊的形態。因為玄武湖位於燕雀湖和宮城之北，故又名「後湖」或「北湖」。秦始皇滅楚後改金陵為秣陵縣，玄武湖更名為秣陵湖，因漢時秣陵都尉蔣子文葬地湖畔，孫吳時孫權為避祖父孫鍾名諱，遂名「蔣陵湖」。劉宋元嘉初年，宋文帝對玄武湖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疏浚，挖出來的湖泥堆積在一起，成了露出水面的小島。其中最大的為「蓬萊」，「方丈」，「瀛洲」三島，合稱「三神山」，或許這就是今天玄武湖中梁洲、環洲和櫻洲的前身。傳說劉宋元嘉二十五年（四四八年），湖中兩次出現「黑龍」（很可能是揚子鱷，俗稱土龍），因而又改稱玄武湖。

（《金陵去來》之四）

個體命運與時代演化的變奏

口家廊 吳小彬

央視名嘴崔永元推出《我的抗戰》和《我的抗戰2》兩部紀錄片。影片採訪了一些老人並通過他們的敘述，回顧上世紀30—40年代的抗日戰爭。久遠的故事、蒼老的面容、緩慢而沉重的述說，在紅塵滾滾的當下自然不會贏得高收視率，可其中一些往事和細節卻讓我感慨不已。

影片中的一幕讓人難忘，盧溝橋事變之後，在河南開封火車站，很多北平和天津的學生跑到了這裡，是繼續跑，還是為了生計先幹點什麼？正猶豫着，來了幾列火車，往哪裡開不知道，學生前呼後擁就上去了。有的火車開到武漢，乘車的學生就加入了國民黨；有的火車開到鄭州，很多人就加入了共產黨。而十年後的巨變表明，上了不同的火車，人的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。

在歷史和時間的洪流中，人就像一片落葉，只能隨波逐流，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。而在一些重要的節點上，人的未來和前途，就是這樣在匆忙、混亂與裹脅中被決定了，全然不讓人分辨、思考和斟酌。

就拿筆者來說。我出生在1958年大躍進的熱潮中，「文革」開始的1966年，我上小學二年級，「文革」結束的1976年，我高中畢業，整個學生時期，都是在紛亂、動盪中度過的。高中畢業後第6天，隨着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潮，我來到華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，與農民一起割麥子種玉米摘棉花，身上被曬得脫了皮，手上滿是血泡。一個秋陽高照的下午，忽然聽剛從城裡辦事回來的同伴悄悄說，「四人幫」被抓起來了，幾天後，全國城鄉鞭炮齊鳴，人們敲鑼打鼓，慶祝十月的偉大勝利。不久時政即大變，我又隨着知青返城的浪潮回到了省城。當時有一項政策是知青可以頂替父母進廠礦工作，於是我便被分到母親原來在的一家棉紡織廠，一幹就是5年。從少年到青年，所有的這些歷程，沒有一次是我能主動選擇的，每一步都是被迫跟隨着時代波動在走。而在工廠的5年，是我一生中最苦悶的時期。雖生長於動盪年代，但我自小喜愛讀書，文史哲無所不讀，下鄉後還嘗試寫作，可在工廠簡單、粗重的勞動中，我的所學所長無可用之地，天天在禁閉式的高強度勞作中耗費青春，心情十分壓抑。1984年，我鼓足勇氣，從工廠辭職出走。稍後，通過一場招聘考試，進入了我現在供職的這家報社，並用自己的文筆和努力工作，在報社確立了自己的位置，做了正式編輯。現在想，這也是拜當時改革開放春風吹進城市之賜，一些事業單位的用人機制變靈活了，而我也恰好在那時離開工廠，並幸運地看到招聘信息參加了考試。那年我26歲了，也算是第一次對自己的人生做了主動選擇。

多年來的閱讀和生活經驗提示我，觀察和評價一件事物、一項策略或一個時代，關鍵要看它們是否適宜人的才智、能力的增長與施展，是否給人以個性自由發揮的空間。一件好的事物或政策，總是富於張力，彈性較大，內在質地寬厚仁慈，開發和激勵人的個性、熱情和想像力，給予人發揮才智和體現個性自由天地的。一個良性的時代，不會逼仄，不會強制，不會暴戾，不會驅迫，它啟人心智，容人思考後再作選擇，讓人看到希望與前景，感到生活是能夠通過努力改善的。對於磨難重重的中國人來說，如果遇到了這樣的政策和時代，那是人生大幸。

以此觀之，上世紀80年代，就非常難得了。當時國家各項策略鼓勵人們學習、追求知識，鼓勵人們打破體制束縛和思想桎梏，去尋求個性發揮和財富增長。不少窮鄉僻壤的平民子弟通過高考，走進大學，畢業後做了政府官員。一些人在致富的過程中，靠着勤奮頑強就「掘到了第一桶金」。像傑克縫紉機公司老闆阮積祥，當年隻身一人從浙江跑到東北大興安嶺補鞋，每天挑着擔子奔波於各大林場，冒着掉進沼澤和落入虎口的危險；像現在「小肥羊帝國」的創始者張鋼，扔掉鋼鐵公司的鐵飯碗，站到集貿市場上天天吆喝賣衣服。這些人後來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。他們的成功表明，那是一個相對公平、正當的時代，那是一個看重個人努力和才華、人可以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心的時代，那是一個社會流動較為順暢的時代。

而近些年，時代氣象大變。以權力和行業壟斷為代表的體制力量佔據了利潤豐厚的經濟領域，許多產業門檻高築，一些大型國企壁壘森嚴，排斥普通民眾的介入。在「國進民退」的大氣候下，像阮積祥和張鋼那樣無權無勢、僅憑勤奮和刻苦也能打出一片天下的人，幾乎不可能再有了。另外，國家對大學畢業生不再統一分配，來自農村和一般城鎮家庭的子弟，即使學習成績優異，也很難走進國家機關做公務員。個人通過努力改善命運的機會越來越少，社會流動近乎停滯。與此同時，新「三座大山」威勢逼人，普通民眾承受着巨大壓力，城市的高房價，更讓無數年輕人愁眉不展，心虛氣短。

我們不能不感嘆，個人生活及命運與國家時代變化的緊密聯繫，前者甚至可以看作是後者的摹本和複製品。當然，國家和社會也有自己的命運，而這種命運，其實又是眾多個體選擇與命運的集合。

縱覽中外古今，普通人在任何時代都要勉力勞作，才得衣食溫飽。讓後來人羨慕的，是那些生活在公平、正當時代的人民；讓人悲傷的，是那些不幸生於戰亂年代顛沛流離的前輩；讓人幸福的，自然是自己恰好生長在一個富裕、安全的國度與時代；而令人欽佩的，是那些靠勇敢、智慧和奮鬥，創造出正義、公平的環境，並親手締造自身命運的人。

不久前，青年作家韓寒發表《談革命》、《說民主》、《要自由》，在網上反響很大。我把這看作是粗略形成的中國中產階級對家國命運的關注，對自身前途的擔憂及試圖把握命運的微弱嘗試。由此引起的討論，如果能開啟更多人的心智，提升公民素養，並形成討論公共政策和社會走向的輿論空間及意見平台，則善莫大焉。

時代變化了，在新的技術手段和信息傳播條件下，人們的生活形態也與以往大為不同。此時此刻，我們不應再跟隨歷史無常的腳步，不應再聽從無法制約的力量主宰自己的命運。我們是否值得擁有一個良好的前途和命運，取決於每個人的見識、選擇和爭取。

■不做隨波逐流的落葉，做自己命運的主人。 網上圖片

幽默老人黃苗子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文化老人、書畫名家黃苗子，走完他的百歲人生，於一月八日逝世。

我與黃老先生不算太熟，但和他的哥哥黃祖芬校長，他的外甥女梁愛詩女士都很熟。黃祖芬擔任中華中學校長，我擔任培僑中學校長，我們都同受港英當局的迫害，黃校長更因此坐過牢。梁愛詩與我在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共事多年，我退位後仍時有往來。認識黃苗子老先生，也是黃祖芬校長介紹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我為學校興建新校舍籌款，黃苗子老先生在北京為我約會許多書畫名家相聚，請他們贈送書畫義賣。記得當年到會的有吳作人夫婦、劉海粟夫婦、李苦禪父子、許麟廬、尹瘦石，以及廣東的老畫家關山月、黎雄才、黃苗子及夫人郁風，共二十餘人。名家相聚，可謂一時之盛。其中大部分人，現在已經作古。但這一場活動，以及後來他們贈送名畫，並在尖沙咀星光行舉行義賣畫展，總應算是文化盛事之一。

在我六十歲的時候，本來並沒有甚麼慶賀活動，但黃祖芬老兄知道了，於是要他的弟弟苗子為我寫一個「壽」字作賀。此字幅成為我的珍藏，製為鏡匾，至今懸於臥室之中。

後來吳作人老先生也為我們題了一個「壽」字，那是為培僑中學四十周年校慶而寫。黃苗子老先生同樣再贈墨寶，寫的是「桃李春風」四個字。

苗子老先生極有幽默感，他曾說過，不應在人死後才開追悼會，因為人已逝去，聽不到追悼詞。說他已經約好來往較多的生前友好，趁我們還活着，花上一天，帶來輓辭、輓聯或者漫畫，或者講幾句悼念的話，讓我們親眼看到，欣賞一番。

記得書法大師啟功生前也曾這樣說過。在一次聚會中，他說，你們就當我已經死了，大家來致悼詞吧，說罷大家哈哈大笑。

像黃苗子這樣長壽的老人，就是因為他生平達觀、謙和、幽默。他寫過一篇「遺囑」，說死後只在屍體上蓋上一塊舊布就夠了，不再開追悼會、座談會，也不要宣讀悼詞。

微笑曲線

隨想國 興國

台灣大選之後，不少民眾對蔡英文的敗選感言，頗為心動，認為她輸得很有風度。但是，跟着前民進黨發言人以個人身份呼籲民眾，拒買HTC的產品，因為王雪紅選前站出來表示，挺主張安定清廉的候選人，令到對民進黨敗選感言感動過的人，變成厭惡。認為那是秋後算帳的舉動，是真正威嚇選民的言論。

這位發言人，除了呼籲拒買HTC產品之外，還罵郭台銘的產品沒有品牌。

和朋友談起郭台銘的產品沒有品牌這件事，朋友說，以前的施振榮說，產品有個微笑曲線的理論，就是高端的製成品，在曲線的最上方左右兩點，而零件製品，就是在下方的一點，用弧線連結起來，就像一個充滿笑容的曲線。

郭台銘的產品，就是微笑曲線下方的一點，而蘋果等品牌的產品，就是微笑曲線上方的兩點，這表示，微笑曲線上方的產品，賺的是大錢。下方的一點，只能賺取微薄的利潤，必須利用廉價的勞動力。言下之意，也有點貶郭台銘的意思。

不過，換個角度思考，如果下方的一點提高了，上方的兩點能跟着升高嗎？如果不能，那就不成為微笑曲線了，那麼消費者能夠在購買產品時，發出會心的微笑嗎？假如沒有低廉的勞動力，微笑曲線就成為一條直線，還有人會製造同樣的產品嗎？這就是廉價所產生的價值所在，為什麼要看貶呢？怎麼能夠看貶呢？應該感謝廉價勞工付出的勞動力，才能讓消費者在微笑曲線裡看到笑容才對吧？

沒有因就沒有果，沒有郭台銘，蘋果等產品就沒有微笑曲線的產生，如果這裡面有貶義的話，為什麼不責備上方的兩點定價太高而去嘲笑下方的一點呢？讓微笑曲線的笑意淺一點，消費者的笑容會不會更燦爛，用膝蓋去想也想得出來吧？

東京夢的追尋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儘管日本的「國力」已大不如前，但於流行文化上去追逐東京夢的作品仍是前仆後繼般出現。最近看宮崎葵主演二〇一〇年的電影《手拉你》（日文原名為《solanin》），發覺東京夢的本質及內涵也在隨時代而慢慢出現變化。

漫畫原著中的主角芽衣子及種田分別來自南北，前者的老家在北方的秋田，後者的故鄉則位於南面的福岡。兩人在東京的大學結識且開始交往，作品刻劃他們和一伙合組樂隊的朋友，於現實中追逐音樂夢想和成為上班族之間的角力掙扎，當中自然不失歌頌愛情及友情榮光的勵志激情場面在內。

這一類作品在日本可謂時有可見，但我想提出的是，由八十年代開展的東京夢故事（也即是日語中的「上京」一詞），最初往往把城鄉作二元對立的比照，但隨着經濟上的泡沫爆破，再加上大都會的工作條件及機會大不如前，東京夢的內涵亦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形。簡言之，首先城鄉再不屬截然對立的二端，正如《樂與路》的種田在考慮與芽衣子分手之際，正好在積極構思回鄉扎根的打算，甚至已通知了父親。如果回想起《爆粗band友》的根岸，其實在老家也完全可以融入其中；而在吉田修一的小說中，不少「上京」人物其實也沒有特定追求的甚麼目標，只不過父母希望子女可以較自己見識更廣闊的世界而已。

此所以在千禧年的東京夢中，即使有一定的夢想範疇作包裝（燃起激情的行業，如《爆漫》中的漫畫，又或是《大東京玩具箱》中的電玩界等），到頭來觸動人心的仍是人際網絡及交往關係的建構。夢想的追求不一定指向成功或出人頭地，《樂與路》便刻劃樂隊放棄為偶像作幕後支援的商業出道邀請，最後甚至連有否作現場表演的機會也成為疑問，不過一切無損故事中的氛圍，因為同道中人的同喜同悲所建構出來的「擬家族關係」，才是大家珍惜銘感的。在經濟實力已開始被中國迎頭趕上，以及經歷核電廠風波之後，如何重構新世代的「擬家族圈」，大抵更加有另一重時代意義。